

女性

生存状态透视

广西少数民族女性口述史

朱慧珍 / 主编

NÜ XING
SHENGCUN ZHUANGTAI KOU SHI



广西师范大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女性

生存状态透视

广西少数民族女性口述史

朱慧珍 /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生存状态透视: 广西少数民族女性口述史 /
朱慧珍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95-4425-7

I. ①女… II. ①朱… III. ①少数民族—女性—社会
生活—历史—广西 IV. ①D44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782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225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录

在血与火中历练成钢

——壮族革命老人黄美伦口述史 朱慧珍访谈整理/001

名人光环下的普通人生

——壮族妇女陆玉珍口述史 陆晓芹访谈整理/008

壮族女性与民歌传承

——歌王黄月香口述史 黄晓娟、黎学锐访谈整理/021

酸甜苦辣都是歌

——壮族民间歌手苏玉清口述史 陆晓芹访谈整理/034

一位壮家女子的曲折人生

——黄淑贤口述史 陈丽琴访谈整理/044

瑶乡唐五妹今昔

——瑶族女性唐侦口述史 朱慧珍访谈整理/056

歌王之路

——瑶族女性胡惠兰口述史 陆晓芹访谈整理/062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苗族女干部石干珍口述史 ... 朱慧珍、陆晓芹访谈整理/077

历尽寒冬春来临

——苗族女性滚丽萍口述史 朱慧珍访谈整理/091

苗寨飞出的金凤凰

——新中国第一位苗族女教授朱慧珍口述史
..... 陆晓芹、覃健访谈整理/112

平凡中见精神

——苗族村妇女主任龙绍芬口述史
..... 朱慧珍、陆晓芹访谈整理/130

隆林苗族妇女的辛酸泪

——杨富芬口述史 …………… 吴兰、陆晓芹访谈录整理/136

子规啼血报春晖

——侗族女副县长吴桂贞口述史 …………… 梁旋云访谈录整理/148

给毛主席献过花的幸运者

——吴英花访谈录 …………… 吴桂贞、吴美莲访谈录整理/158

艰难的起飞

——侗族女干部吴美贞访谈录 …… 吴桂贞、吴美莲访谈录整理/164

含辛茹苦侗家女

——吴财花访谈录 …………… 吴桂贞、吴美莲访谈录整理/170

仫佬族第一位女大学教师

——吴盛枝访谈录 …………… 朱慧珍访谈录整理/173

在困境中求生存

——仫佬族女性吴谢兰口述史 …………… 雷晓臻访谈录整理/177

与共和国一同成长

——毛南族女干部谭凤青口述史 …………… 吴兰访谈录整理/188

她见证了广西民院的创立和发展历程

——回族女性宋明华口述史 …………… 朱慧珍访谈录整理/204

京族哈妹的多彩人生

——京族阮成珍口述史 …………… 吴兰访谈录整理/208

泥泞的一生

——彝族老母亲梁氏嫩的自述 …………… 王光荣访谈录整理/219

受尽苦难 自强不息

——水族妇女杨新菊口述史 …………… 吴兰访谈录整理/227

个体历程与时代叙事

——仫佬族女干部郭秀玉口述史 …… 吴兰、陆晓芹访谈录整理/238

后 记/256

在血与火中历练成钢

——壮族革命老人黄美伦口述史

朱慧珍访谈录整理

访谈背景：访谈人从牙美昌同志处得知他的岳母黄美伦是壮族著名的农民革命运动领导人、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人称拔哥）的弟媳，革命烈士韦菁的妻子。革命老人黄美伦本人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在韦拔群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革命，坐过牢，遭受过敌人酷刑，但她革命意志顽强，立场坚定，是近代少数民族革命妇女的优秀代表，遂决定采访她。

被访人黄美伦，壮族，女，广西东兰县武篆乡上墟村人。1921 年参加革命活动，1926 年参加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后任东兰革命根据地妇女委员会主任，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兰县妇联主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当选为自治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第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我不懂我是哪一年出生的，只懂得我今年是 95 岁。

我 21 岁那年参加打游击，负责送信、宣传等工作。后来拔哥（韦拔群，著名农民革命运动领导人，黄美伦丈夫的亲兄长）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来，1925 年成立东兰农民协会，开办第一届农民运动

讲习所，地点在东兰的列宁岩。参加讲习所学习的有100多人，当时，我不能参加，主要是为讲习所的人筹粮。粮食不够吃，拔哥就从家里拿出粮食来。1926年4月开办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男的，也有女的，女的要80人，结果只来了62个。那时好困难哟，女的想来又不敢来，家里也不给来，歧视妇女，不给妇女读书，不给妇女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我就去向她们宣传，我讲：“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为什么男的能读书，女的就不能读？”另一个问题是妇女婚姻不自由。我4岁就许给人家当童养媳，你讲难不难？

1926年，敌人又来破坏我们，讲习所暂时解散，后来又恢复，学习了两个多月。再后来就成立了东兰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妇女委员会，开始我当妇女委员，后来又选我当妇女委员会主任。1929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初经拔哥介绍，我与拔哥的胞弟韦菁结婚（当时他担任东兰县委书记，后来又到凤山当县委书记）。1930年7月组织上派我到右江苏维埃工作。当时是拔哥、邓小平、张云逸组织我们去的。我到那里去组织妇联，去做宣传发动工作。1931年，拔哥的老婆死了，我爱人把我从右江接回来安慰老妈妈。当时，国民党又来围剿我们，我们进了西山，山高高的，里面有山洞，还有十几间房子。那里有瑶族、壮族、汉族，我们的伙食全部由瑶族供应。

在大革命中我先后三次负伤，我的右手腕已经残废（她伸出右手腕，手腕处凹下去了一块，已畸形）。那是1932年6月，为了保护党的一笔经费负伤的。那天，我奉拔哥的命令到凤弄乡苏维埃领取两百块大洋。晚上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敌人，我单枪匹马，被敌人逼到了一个山崖上。当时我想，自己牺牲不要紧，党的这笔经费决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当敌人快追到我的身边时，我咬牙闭眼，纵身跳下悬崖。追上来的敌人胡乱打了一阵枪，又滚下几块石头，以为我死了，才嘻嘻哈哈地回去。幸亏山间杂草又深又厚，我没有摔死，也没有被敌人的枪打中，只是摔掉了几颗门牙，摔断了手腕骨。敌人走后，我摸了摸两边腋下的光洋还在，心里很高兴。我忘记了饥饿与疼痛，拔

开草丛，爬出一段很长的山沟，终于在天亮前回到了拔哥的住地。那时，我正怀着孩子，到住地不久就小产了。但我抵制住自己的悲伤，因为我觉得我尽了我的力量，保护了党的经费，帮助了党在今后的活动。

斗争越来越残酷。1932年10月19日，拔哥被叛徒韦日昂杀害了。我的丈夫韦菁奉命去找党中央也在香港被叛徒出卖光荣牺牲了。我和其他同志在西山坚持斗争。1932年9月29日，韦日昂派人来抓我，把我押到武篆，关在魁星楼，问我游击队的人躲在哪里，枪在哪里，钱在哪里，我总说不知道。他们不给我饭吃，还绑我的手把我吊起来（她向采访者伸出两手，手指骨折，均已弯曲）。又用钉子钉我的脚，用枪打我的腰，打断了两根肋骨（指着右边腰部给采访者看），我就是什么也不讲。不能讲啊！我是党的人，死就死自己，不能危害革命，危害同志。

敌人关了我半年多，严刑拷打，我就是不说，他们没办法，又把我押送到匪首罗活的老巢——陆川县平乐区六寒村继续管制，同时把我卖给一个残废老人罗二做老婆。我不同意，拼命反抗。我跳河、装疯，还从一个被卖给地主的女人那里得到一节烟土，吞烟自杀，可是都没有死，后来那个老人也不敢要我了。我就逃到北流县隆盛。在那漫长而艰苦的日子里，我无时不在想念党组织，无时不在思念自己的亲人。直到1948年10月，我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在玉林一带打游击，迎接广西的解放。1949年解放了，我在陆川当妇联主任。后来报纸上登了我的事，东兰人才知道我没有死，要我回东兰。我于1953年农历三月初八回到了我的家乡东兰。

解放后，我拖着带伤的身体拼命为党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54年我被群众选为代表，出席桂西僮族自治区代表大会。1957年又被选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妇联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58年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军烈属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怀疑是叛徒，受到审查，下放到牛棚里去劳

动。但我始终相信党中央，相信人民绝不会冤枉自己的儿女。坟头上的乌鸦终于被赶走，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革老”政策，组织上恢复了我的工作，安排我在县妇联当副主任。我恢复工作后，更加珍惜自己的有生之年，抓紧时间多做工作。我到县妇联后，看到县委、县政府机关没有一个托儿所，许多干部、职工的工作受到影响，就和妇联的同志商量，决定办一个托儿所。我亲自抓这项工作，从请示领导到资金落实，从挑选老师到找场地，都亲自奔走。在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办起了一个托儿组，解决了机关托儿难的问题。平时，我坚持同妇联的同志下乡工作，解决各种纠纷，促进安定团结。比如，当时的城厢大队新兴生产队有一户社员，由于婆媳关系不好，引起夫妻吵闹，长期分居。我深入了解这个家庭的纠纷原因后，分别找家婆和小两口谈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终于改善了婆媳之间和夫妻之间的关系，使这对分居了18年的夫妻言归于好。

我一心想多吃一些工作，只恨我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又有高血压，经常发作，不能如愿。1979年9月，我又病倒了，组织上对我很关心，把我送到南宁住院治疗。自治区领导、县领导经常来看望我，县妇联又专门派了一位女同志到医院来护理我。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只不过为革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组织上就这样关怀我，我病了不能做工作，已经给革命带来了损失，组织上又特地安排一个同志来护理我，我怎么过意得去呢？我多次催促前来护理我的同志回去工作，可是她说这是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真叫我没办法。我身在医院但心里老想着家里的工作，只好叫来护理我的同志经常写信回去询问家里的工作情况，这样心里才踏实一些。我住院四个月后又回到了县里，但医院还叫我全休四个月，我怎么能闲得下去？我在修养期间，只要身体感觉好一点就坚持去上班。领导和同志们都劝我好好修养，他们说：“您老人家健康长寿我们就高兴了，工作上年轻人多做一些就行了，您就放心吧。”我是放心年轻人的，但我还活着就要干

革命，只要还能动我就要工作。下不了乡就在办公室了解一些情况，动动嘴巴。当我了解到大队一级的妇女干部因报酬问题没有解决而不安心工作时，我一面向县委反映这个问题，一面召开妇女干部会，对她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说：“报酬问题是要解决的，但革命工作本身是带有义务性的，要得报酬才肯工作，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过去我们组织妇女打土豪，支援红军，有谁得到什么报酬了？大革命失败后，我们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我在田阳的那磨隐蔽时，暗中联络了五个同志，秘密带到西山见拔哥。拔哥给我们分配工作时又有谁想到什么报酬？革命先烈不惜牺牲为我们打下江山，我们今天坐江山过上幸福日子，怎么能够因为报酬问题而影响工作呢？”

1980年，我们县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选举我当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到人大后，工作担子更重了，而且是新机关、新工作，没有现成经验。但我想，自己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行使权力的，一定要为人民办好事情，做好工作。当时东兰县武篆公社那烈大队的东里片有几十个户主写报告给县、地区、自治区，要求单独成立东里大队。公社、大队的干部多次下去做工作都得不到解决，而且越闹越凶。东里是韦拔群的故乡，右江革命的发源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那里的基本群众是好的，为什么会闹分大队的问题呢？我决定下去一趟。但县领导同志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要派别的同志去，不让我去。我说我一定要去，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县领导见我一定要去，决定派小车送我。我想，其他的领导同志比我忙，更需要小车，我还是坐班车去。我到公社初步了解一下情况后就叫东里片的队干来了解闹分队的真正原因，随后一家一户地登门谈心，了解群众情绪。每次开会常常超过半夜十二点，同群众谈心也常常到深夜两三点。干部对我不敢讲假话，群众对我是知心的。经过几天的调查了解，我终于掌握了真实情况，原来煽动分队的只是少数几个人，他们想当大队干部，然后以韦拔群故乡的名义向上伸手要求照顾，从中捞好处。有些群众听了他们的煽动，觉得韦拔群故乡单独成

立一个大队,以后出去外面特别光荣、吃香。还有的户主根本不知道他们写的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叫签名盖章就照办了。我根据这些情况分别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对群众说:“拔哥当年闹革命是搞五湖四海的,农讲所、赤卫队、红七军都是由来自广西各个民族的青壮年组成的,我们现在同那烈共一个大队都不行,这符合拔哥的遗志吗,符合党中央安定团结的精神吗?再说东里户数少,人口少,土地少,分大队以后要单独负担大队干部、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的统筹,你们不是更加困难了吗?”通过做思想工作,大部分群众思想通了,表示不再闹分队,要同那烈队的群众搞好团结,搞好生产。但是极少数人仍然不服气,他们还是打着拥护拔哥、爱戴拔哥的旗号继续坚持闹分队。我看穿了这些人的内心,非常气愤。我在群众大会上说:“拔哥当年闹革命是为了全民族,不是光为我们东里,更不是为你们少数人捞资本。你们口口声声拥护拔哥,爱戴拔哥,为什么1932年10月19日拔哥遇难时,你们有六户却连夜杀鸡庆贺,你们是真正拥护拔哥、爱戴拔哥吗?”带头闹事的人被我这样一揭露,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我又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工作,促进了他们的团结,与那烈分队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我一直工作到80岁才离休。我这个人,平时不论工作大小,只要能够做的就尽力去做。我上了年纪,睡不着觉,每天起得很早,起床后就到办公室扫地、打开水、收拾和准备各种用具,便于同志们一到就能马上工作。每次院内搞环境卫生或者上街大扫除,我都尽量参加。今年二月底,我从南宁回东兰,头一天坐了十小时的汽车,很疲劳,第二天,全县投入文明礼貌月活动,我很高兴,忘记了疲劳,一早就起来参加全城大扫除,美化环境。我觉得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也是革命工作的一个内容,能够做不去做,心里实在过不去。

为了革命,我牺牲了家庭,失去了亲人。我只有一个养女,而且养女和女婿都在南宁工作,我一个人在东兰工作,但是,我并不感到寂寞,革命大家庭是温暖的,革命队伍就是我的家,广大青少年都是

我的孩子。为了使孩子们茁壮成长,以后能够接好革命的班,我把教育青少年作为自己的责任,经常给他们讲革命斗争的故事,每逢“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我都应邀到学校去作报告。我不仅在县城讲,还下乡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子孙后代能接好革命的班,保我江山万代红!

访谈对象:黄美伦

采访人:朱慧珍

访谈时间:1994年7月1日、2日

访谈地点:牙美昌家

后记:这份访谈录原是应《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口述史》编委会之约进行采写的,时间是1994年7月1日和2日,访谈地点为广西民族学院原科研科科长牙美昌同志家,访谈时牙美昌夫妇(黄美伦的养女和女婿)在座。由于种种原因,此稿未能按时整理送编委会,让它一直躺在我的书柜里达12年。最近整理书稿,重读这份记录稿,颇为受益。虽然黄美伦老人已离我们而去,但将这份珍贵的遗产公之于众,既可激励后人,又可慰藉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遂决定整理成文以飨读者。采访时,老人年事已高,普通话不十分流利(经常夹杂些壮语),谈话头绪较乱。为弥补老人谈话之不足,采访者除了多次登门访谈外,还参照了黄美伦本人82岁时写的一份自传。

名人光环下的普通人生 ——壮族妇女陆玉珍口述史

陆晓芹访谈整理

访谈背景：因为义务赡养两位老人，陆玉珍在广西靖西县十里八乡算是一个名人：从上世纪90代以来，加诸她身上的有“靖西县个体十大女杰”、靖西县第一届“孝亲敬老之星”、“感动百色十大人物”、“广西敬老好女儿美德奖”、“中华孝亲敬老楷模提名奖”等荣誉，她还曾于2006年10月赴京受奖。2008年4月，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的活动，她又作为“孝老爱亲好人”，成为广西各地推荐的第一批24位“身边好人”候选人之一。在广西电视台、《中国妇女报》、《南国早报》、《右江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中，她是英雄。2007年初，她因车祸受伤，网上发出了《谁来救救我们的英雄？》的帖子。那么，在这一道道光环的背后，这位农村妇女经历了怎样的普通人生？作为陆玉珍的侄女，笔者了解发生在她身上的许多事情，并先后于2008年2月11日、10月29日对她进行了专门访谈。对话以壮语德靖土语的“爽”话进行，两人以姑侄相称。以下文字在两次谈话录音的基础上翻译、整理而成，力求贴近受访者表述的事实。

我的家庭

我叫陆玉珍，1944年2月3日出生，今年65岁。我出生在广西

靖西县果乐乡交怀村大足屯，现在住在龙临镇龙门村。我祖父有四个孩子，分别是我父亲、叔叔和两个姑姑。父亲有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在八兄弟姐妹中，我排在第四，上面有大姐、二姐和大哥，下面是二弟、四妹、三弟、四弟。

我爸当过国民党的副乡长，不过，快解放时他去参加游击队，当了柴粮干事，专门管弹药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看成是“残渣余孽”，差点被批斗了。我们也成了残渣余孽的儿女，受了牵连：大姐本来可以去北京开会的，但后来被别人顶掉；二弟考大学时，因为社会关系不好，没能上，当民办教师十几年，也总是不能转正。他后来帮别人看卦，1979年去世。村上坡下，没有人说他心肠不好。

我妈是附近甘怀屯翟家的姑娘，比我爸大五岁。在那个年代，儿女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算命的说过，我妈见四度红天，一生要嫁七个人，所以别人不敢去娶，是我爸娶了她。不过，她一生也只嫁给我爸而已，虽然我爸确实先去了几年。我妈待人很好，也不怕辛苦。每天三趟马五批客，锅头从来不离开火。家里的客人，无论是我爸的，还是我们的，她都一律好好招待，煮给吃的才让出门。她的思想也很开通，在外面见到什么事情，都会说出来，教育我们。有一户人家，婆婆做菜切萝卜时有厚有薄，吃饭的时候，做媳妇的觉得厚的不好吃，就剔往老人那一边，把好吃的留给自己。我妈看见以后，回来对我们说：“给别人当媳妇，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将来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老人切菜，你觉得不好吃、不好看也就算了，不要推到他跟前去。”她吃东西时，好吃的总是先推给别人，不会自己偷偷摸摸地吃或是狼吞虎咽。她是1983年去世的。

我大姐应该是1936年出生的。她从来没有正式上过学校，只上过几个月的夜校。但她人比较灵活，什么事情都自己学习。她是最大的孩子，也就最辛苦，经常要为弟妹做衣服。那时候，因为弟妹多，家里很困难，她就去种一点棉花，然后挑出来纺成线、织成布，再染上颜色，为弟妹做衣服。我四妹去外面读书以后，她每年还要帮做两套衣服。所以说，家里什么事情都是她照顾着。她的手很巧，心也勤想，总是知道要做什么。她从解放以后就开始参加工作，当过幼儿园

老师、接生员，后来做妇女主任，直到1962年才由我接手。她这个人啊，对穷人很怜悯，也很能干，不怕苦，多苦都尽力去做。她没有读过书，结果却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都是自学的。鞋子做得很好，连扣子都很讲究。1967、1968年被下放时，孩子没有吃的，她就自己到河边钓鱼。她这个人，能上山，能下水，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60年代时，她曾经被评为优秀，本来要去北京开会，但因为我爸解放前做过副乡长，是“残渣余孽”，家庭阶级成分不好，结果她就没去成。经过这件事以后，她继续自学，做接生员，后来考得了医师资格，转正做了医生。从接生员到国家助产士，都是她个人奋斗的结果。她1962年去渠洋，后来还当了党支部书记。现在退休这么多年了，还一直在做着妇产科方面的工作，帮助妇女排忧解难。

下来是我二姐。她没读过书，去夜校也不勤快，就喜欢耍风流，喜欢和小伙子谈笑，不专心学习，所以不怎么认字。她性格也不太好，不喜欢听别人的话，有事情时反对的比较多。不过，她也很能干，嘴上说完又去做。当时没有吃的，她会用木薯粉做成糍粑给大家吃。所以，她也是很会做事的。但她这辈子很苦，生第三个孩子时就死了，当时才三十多岁，这应该是1974、1975年的事了。她的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名声，什么事情都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算，不是太认真。不过如果要做也能做好，比如做鞋子，她躺着也绣得成，还会织布，什么都会，就是比较粗心，不太精心细致。她是1958、1959年左右结婚的，当时还在吃集体食堂。

我大哥小时候不喜欢干活，说话、做事都比较粗糙，不太讲什么道理。在我们家，他是第一个男孩子，比较金贵，所以家里有事也不太叫他做。一来二去，他就变得有些懒了。不过，他读书比较好，很会背书。读到初中毕业，就分配了工作，到靖西大饭店干活，可是没做到头。他这个人，和别人说话时不知深浅，后来被退回村里了。我们家的人都不差，会想会做。就说现在，家里几亩田地，他自己耕耘、自己看田水、自己打农药，什么都能做、自己掌握。小时候，他因为是第一个男孩，家里不给他做太多，就变得不喜欢做。但到现在，是很能干的，只是说话做事还是不太讲道理，总是觉得自己最好。

二弟比我小两岁，他比较老实、害羞，什么事情都谦虚谨慎，不敢做，别人分给就有吃的，不分给就没吃的。他读书也是老老实实的。读初中时，家里困难，他穿着一件只有三个扣子的上衣，戴一个难看的帽子，照样走去走回，家里没有钱，只能借得多少就给多少，他到学校以后也会节约着用。到靖西中学上高中时，家里没钱，就帮别人榨油茶果，得来钱给他作伙食费。他高中毕业时，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上大学，回到村里。我当时正在村里教书，但不会说标准的普通话，就自动让给他来做。我干活比他厉害，肩膀不会疼，挣工分比他多，他教书也比较容易。他在村里教了十几年，后来直接考到百色地区的教研室，又当了中专、大学老师，都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下来是我四妹。她这个人太老实了，是老好人。她永远坐在清静的地方，不会去和别人争什么。她很少说话，但说的都是真话。她和我二弟的性格差不多，都很老实，不敢说话。她的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对人也总是那么好。即使正在哭鼻子，见有人来，也会抹干眼泪走出来热情招待。她太老实了，即使肚子正饿着，也会说“已经吃过了”，什么都先让给别人，有时显得太谦虚了。我曾经想，这样的人怎样才能过完一辈子啊？太难了。先嫁的那一家不合适，后来嫁的那个人又是那个样子。不过，她后来也当了副镇长、县老龄办的主任，现在退休了，也安好家、起好房了，只是还欠着一点债。

下面是我三弟。他是懂点事的，有主意，能想出办法，就是脾气不好，有点小气，别人说不得。我们这儿“挑纲要”的那些年，他还挑瓦片去换米来给家里。为他做的一件土布上衣，他也拿去换得一担米。他还会木工和其他手艺。别人都说大年初一不能砍柴，他却不管那么多，有时会一下子去砍来几捆。说起来，大年初一有谁到郊外劳动的？他结婚十几年都没有孩子，因为女方很少来家里，两人感情不好，要不到孩子。娶第二个以后，妻子怀孕了，却难产死了。他对第三个没有感情。对方已经有孩子，母女都靠他养活，他要去挑矿养家。他一辈子太苦了，生活苦、做工苦，娶三次妻子，得不到一点儿快乐，1995年就因为肝病去世了。

最小的是我四弟。他为人灵动，做什么事情都很用心用力，懂得

钻研,也有技术,仅次于我二弟。他小时候,吃奶吃到八岁,开始时做什么事都很幼稚。后来考上大学,但看家里困难就退学去当煤矿工人了。现在也退休了。他这辈子不太容易,也不算苦,中等吧。

我们家一直有敬老爱幼的好名声,从老的到小的,无论是谁,都做得很好,村上坡下也同样觉得好。我爸要去世的时候,把我们都叫到跟前,说他有四个儿子,算上我就是五个,每个人都有得吃的,不用担心。现在确实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自食其力,也不觉得有特别大的困难。这都是父母教出来的。爸爸就曾经对我说:“无论去哪个地方,干部就像一颗种子,群众就像泥土。到哪儿都要好好联系。”

艰难生活

家里因为孩子多,田地少,而且大多是山窝里的旱地,所以生活比较穷苦。为了八个孩子有衣服穿,我妈总是先到山里锄地种棉花,然后纺线、织布、染色,再做成衣服。不过,孩子太多了,有时得了上衣就没有裤子,得了裤子就没有上衣,就看自己报名要什么。我喜欢要裤子,因为新裤子配旧上衣比较好看,旧裤子配新上衣不好看。上衣破点烂点也没关系,而且也不是每年都只得一件衣服。有时锄的地比较多,就可以多种些棉花,也可以多得一件。一件上衣可以穿两三年,裤子破得比较快。家里孩子多,没有办法。

我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经常要向别人家借。参加合作社以后,因为干活的人少,得到的工分还是不够吃。1958年“大炼钢铁”时,上面说要消灭杂粮地,连豆苗都被锄掉,家里的粮食也都要上交到集体后再分下来,我们家每天就只分到12两米,煮熟后只够每人一碗。于是,给孩子喂奶或干活的人就可以吃一碗大些的。我妈就每次都说:“我饱了,我饱了。”这样一来二去,她就得了浮肿。二姐去食堂帮挑水,没东西吃就拿米糠来煮,结果拉不出大便。

等到孩子们渐渐能帮干活,生活好一些的时候,就碰上分田到户了。从那以后,家里就够吃了。可惜老人没有机会享受,我爸1979年因为肠梗阻去世,我妈因为胃肠炎,1983年也不在了。如果他们还活到现在,该有多好啊。现在,家里每个人都能挣钱,都有好吃的,